

代表理论的内涵

——与汉娜·皮特金的对话*

〔美〕汉娜·皮特金 〔美〕南希·罗森布鲁姆
陈平 李妍妍**译

提 要 | 2014年春天,南希·罗森布鲁姆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汉娜·皮特金进行了采访。汉娜·皮特金因其开创性的理论工作,尤其在代表问题上的贡献,获得2003年斯凯特奖。^①在这次采访中,汉娜·皮特金教授与南希·罗森布鲁姆教授谈论了自己对代表理论、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的研究,及性别研究、政治理论中早期的概念分析、政治主张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内容。

关键词 | 民主理论 集体行动 维特根斯坦 马基雅维利 阿伦特

中图分类号 | D08

作者信息 | 〔美〕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1931年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荣誉教授。

〔美〕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nblum),1947年生,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一、个人背景

南希·罗森布鲁姆教授(以下简称NR):汉娜,我们从您的出生开始谈起。

汉娜·皮特金教授(以下简称HP):我于1931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左翼知识分子家庭。1933年父母带着我们搬离了那里。我们最先去了挪威的奥斯陆,因为父亲曾是一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培训过一些挪威分析学家,那时他们已经返回挪威进行实践。当他们目睹德国的形势后邀请父亲去奥斯陆组建一个研究小组。

因此我们去了那里,但由于各种原因,我父母想回到欧洲大陆,两年之后我们搬到了布拉格,那里有许多避难的德裔犹太分析学家。之后,我父母开始申请去美国,当我6、7

岁时,我们来到了洛杉矶,这里也有许多避难的犹太分析学家。

NR:您的研究转向了语言和文字,您曾

* 原文题为“A Conversation with Hanna Pitkin”,刊登于《政治科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年第18期,第1~10页。译文有删减。该译文系山东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研究项目”(16CZLJ08)的阶段性成果。

** 译者信息:陈平,1988年生,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266101;李妍妍,1989年生,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

① 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被称为政治学的诺贝尔奖,由约翰·斯凯特基金会颁发。该奖项始于1995年,获奖者必须是“对政治科学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的学者。

说您对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欣赏。您刚刚已经给出了一种解释：语言的变化。您的父亲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早期精神分析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好奇地是他……

HP:他是第三代。他没有被弗洛伊德本人分析过。他是一名老师,写了一本重要的教科书,相对其他分析学家来说,他似乎是伟大的。

NR:是的,《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这对您有影响吗?我认为精神分析对于您转向文字有一些影响。

HP:一定有影响。部分影响来自父母对文字和理念的广泛关注。比如,我母亲对教育学非常感兴趣。她当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老师,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对如何教育孩子使他们神经不敏感这一问题感兴趣。而且他们(父母)都非常幽默,喜欢阅读。他们进行许多文字游戏,讨论书籍,互相阅读,给我大声朗读,最初也给我写诗和故事,之后我也参与进去。

NR:您什么时候决定从事学术?您什么时候意识到将从事政治理论?

HP:从未意识到!我在学校的表现总是很好,在教育阶段总是不断获得提升,我一直做得很好。但我从没有决定从事学术。我清楚地记得,在要求严格的研究撰写论文时,我曾慎重地考虑其他职业。当然,我是想献身于知识领域的,那是我内心的想法。

二、代表理论

NR:《代表的概念》是您的第一本著作。我记得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曾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评论这本书:“我敢说这是一本让我以评论它而感到自豪的著作。”这本书影响很大,仍然是我的学生的阅读书目之一。什么因素促使您写此书?

HP: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研究生工作的第一年,与托马斯·詹金(Thomas

Jenkin)一起出席研讨会时,T. D. 韦尔登(T. D. Weldon)的《政治学词汇》(*Vocabulary of Politics*)刚刚出版,学界刚刚对政治理论的分支——政治概念产生兴趣。托马斯·詹金让我们从政治学概念的单子上选择一个条目,写成研讨会论文。我选代表概念并非出于很好的原因。

我曾在伯克利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申请回到政治学研究生院读书,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我认为能获得奖学金的领域,那是我的本科专业。在伯克利,我见过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之后他加入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他给我介绍了奥斯丁(J. L. Austin)的著作及日常语言哲学。

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当时是我的毕业论文的答辩主席,我是他的助教,我记得曾问他,我能否写一篇有关某个概念并运用一些技术的毕业论文。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沃林回答:“为什么不呢?”因此,我选了代表这一概念,因为我已经写了那篇论文。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提出问题,因此我在第一章的写作上花费了相当一段时间。

NR:现在再去审视那本书,您有没有想进行修改?或者从结构设计上反思之前写的东西?

HP:当我遇到一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往往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否定回答,意思是说我出版这本书之后就不再思考代表的问题,这是我的一种常态。这种综合征类似“我不想成为一个愿意接受我的俱乐部的一员”(Any club that would accept me, I wouldn't care to be a member of),这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还是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说过的话?我总是感觉任何我已经写出的东西都不值得获得大量关注。一旦完成一部著作,我就倾向于抽离出来,因此我不再研究代表理论。但是当我因那本书获得斯凯特奖(Skytte Prize)时,他们要求我领奖时准备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我当时

说,“我已经数十年不碰了”,他们说,“没关系”。因此我开始思考,的确发现在这本书中,我没有思考到一些应该涉及的内容。因此我写了一篇小论文,关于是否存在一种通过选举方式获得的民主,或者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张力。

NR:今天大量的民主理论至少在关于代表问题上矛盾的。对此您也发表过意见。您一方面认为——这在书中有表达,代表、委托、协调、联合及其他转移的形式与民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您也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即它们不会轻易地联合。您对此谈谈,或者回到您刚才所说的论文。

HP:民主是通用词语之一,但是,您认为民主意味着民众(demos)能够自我管理或民众统治国家和政体——歧义已经出现在“民众”上。您认为民众与其他统治整个社会的阶层或阶级有明显不同吗?或者您认为每个人自我统治,彼此联合?

当自我定义为民主派时,我倾向于后者的解读。如果您接受这种解读,即在人数众多的民众中实现民主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无法见面进行沟通。即使他们有邮箱、脸书或其他,您能看到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当我们试图判断某一个国家、政府或组织是否民主,我们真正考虑的是人民是否实行自我管理。况且存在数百种标准,测定这些标准的方式众多,您需要把这些标准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的判断。民主从来不完美,只是程度问题。这也是这一术语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代表能够使一个大型社会通过相对民主的方式实现管理,但是很明显无法达到小政体的民主。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NR:我认为这些思想和您的书对那些正在思考各式各样具有想象力的设计的民主理论家来说是相当中肯的。有时这些设计是现实的实验,如推行的公民陪审团,有时像富有想象力的事物。但是问题在于,什么使它们具有代表性?它们为何能够代表?

HP:什么使它们具有代表性?什么使它

们具有民主性?两个问题具有相关性,但并不是一个问题。

NR:是的,这在今天的民主理论中仍然存在。

HP:我认为这也是这本书获奖的原因,但这真不算这本书的功劳。

三、维特根斯坦与概念分析

NR:《代表的概念》一书中采用的概念方法成为您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核心。我接下来要读一段:“因为人类不只是政治动物,也是语言运用的动物,他们的行为被思想塑造。做什么及如何做取决于他们在世界中如何看待自己,取决于他们理解的概念。”

因此您总结,维特根斯坦对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对概念的明确,对理论家语言运用的敏感性。如今这似乎很明显,但在您写作时并非如此,我好奇的一点是,当时怎样的政治理论使您得出这种判断?

HP:据我所知,韦尔登的著作刚刚出版时,政治理论开始对行为感兴趣。在当时,政治理论总是围绕文本进行分析,注重文字、文字意义的变化及对含糊概念的解读。出现的新变化使政治学有了一个明确的核心和技术方法。

当然,这存在风险,因为如果它变成一种技术方法,很可能与它研究的内容割裂。政治学似乎将更多精力放在方法论而非实质内容上。

NR:您认为,对于今天从事概念分析的人们来说,一种非常细致独特的方法已经失去优势了吗?

HP:不是,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够了解今天从事概念分析的人们,因而无法作出任何判断。我认为在知识领域中任何新方法的长期存在都是一种危险:你想教其他人如何运用这种有效的思维模式,比如你讲授一门有关的课程,但这门课程占据了原本应当用于其他更具有实质内容的课程的时间。

NR:您现在仍然讲授研究生课程,您在

课程中也这样吗？

HP:是的。我一直做有关概念分析的研究,而且已经有一整门课程讲授方法论。

四、马基雅维利与女权主义

NR:让我们谈谈您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及其与英雄主义、军国主义的关系,以及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诋毁等的研究。您探究过他(马基雅维利)对男性气概的关注。您使其男性气概的研究浮出水面,这是之前对马基雅维利及其美德、财富的研究没有涉及的。我认为这是女权主义研究相对较早的著作,之后成为一种“村舍工业”(a cottage industry)。

HP:我不明白“cottage”的意思。

NR: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层面的生产者。在谈论马基雅维利时,您说,从性别暴力、性别主导及其将女性看做具有腐蚀性和依赖性的论述,可以得出他厌恶女性的结论。我很好奇,什么导致您得出此结论?您在以读者和解读者的身份阅读这些书的时候,总是保持一种性别意识吗?

HP: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出版上一本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越来越焦虑。我的职业将会怎样?我已经很久不写文章了。我当时正在教授一门本科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讲授了一节有关马基雅维利的课程,其中很少一部分涉及马基雅维利对男人气概的矛盾观点。一方面,他认同狡猾的狐狸,但另一方面,他号召意大利公民实行自我统治。我讲授这门课时,有一名学生课后显得非常激动兴奋,他说这对他非常重要。带着对出版书的焦虑,我回家后想到,我的确从未在其他地方读到过这种观点,这是我的观点。我为何不写一篇简短的小文章发表呢?那样就不会把自己陷进去。

当一个想法划过我的脑海时,即描写马基雅维利的男性气概的冲突时,作为一名女性,我不知道那个时代普通家庭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家庭的处境。我认为应该为此做一个

脚注,因此找到书架上能够提供信息的书——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那本《意大利的文艺复兴》(*On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和阿里耶斯(Ariès)的《百年童年》(*Centuries of Childhood*)。

但他们的观点相互冲突,我不知道用哪个做脚注,因此我去图书馆查阅。我记得几个月之后,在系里与诺曼·雅各布森(Norman Jacobson)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我写完了一篇文章,但是脚注比正文部分还长,我该怎么做?”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开始了一本书的写作。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出于女权主义,我的女权主义也不是产生于此。

我的女权主义思想一方面来自我的母亲。当她是女孩时,就进行了一些斗争。当时德国女性上大学几乎不可能,而她上了大学。从各个方面来说,她是一名职业女性,我认为我的父母亲持有共同的不容置疑的观点,即女性当然能够像男性一样思考,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抚养孩子,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我的研究生使我清楚认识到大学中女性的总体环境是怎样的。《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Title IX)颁布以来,美国开始出现范围更广的女权运动,尽管社会环境是不同的,但它仍类似我母亲在德国经历的女权运动。通过聆听我的女学生(我当然将她们视为独立的)讲述她们的学习条件、老师对她们的教导、父母的期望及教导时,我发现了当时学术界多数女性知识分子遇到的困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知道是否属于被赞赏的人,因为我并没有为女性的自由或解放做什么。我争取的是全人类的权利与自由。

NR:好,一个相当中肯的但并不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界定是平等的权利。

HP:那么为何称之为“女权主义”?为何不称之为权利?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总体来说,我对女权主义并不抱有敌意。

NR:让我们暂时回到有关马基雅维利的

那本书,在书中您用了精神分析的框架?

HP:我认为在所有的写作中,精神分析的框架都用到了,但在马基雅维利这本书之前并不清晰。这是我儿时的家庭观,我以儿童的视角进行分析。我觉得父母认为我过于内敛和书呆子气,并不是他们想培养成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小孩。因此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带我去看分析师,而我曾对她撒谎。对我来说,分析师是大人的盟友,我不会对她吐露任何事,包括自己的生活和隐私。

五、阿伦特与集体行动

NR:我们谈谈《攻击“变形怪物”:汉娜·阿伦特的社会概念》(*The Attack of the Blob*)这本书。这本书对汉娜·阿伦特的社会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blob”引起我们对失控的集体生活的科学虚构。如果我解读正确的话,这本书真正试图解释汉娜·阿伦特怎样及为何没有完全承认两者之间的张力,即一方面描绘我们无助,另一方面又有组织。您指出,这不是阿伦特特有的问题,是政治理论的问题,即如何调和目标需求与有效的组织之间的关系。

因此尽管这是有关汉娜·阿伦特的研究,但您在最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抑制我们的环境——抑制我们控制行为结果的能力,抑制产生有意义的计划或政治行为。我认为您有一个非常妙的比喻,“政治总在需要的地方缺失”(the absence of politics where politics belongs)。我好奇的是,您预见到今天政治在需要的地方缺失了吗?

HP:如果您读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会知道,我的确设想了,但现在比当时更为严重。

NR:谈一下我们所经历的活动的局外人吧。

HP:我认为,人们正确理解了事实,即个体在严酷环境下是无力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误解。人们过着困难的生活,总体上来说,如果我们聚集起来可能会改变不良的

环境。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会毁灭人类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我们继续且必须如此,因为人们的工作依赖于此,孩子的生活依赖于他们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如何认识自己,因此我们这样对待自己。

NR:创新与行动的问题尤其是集体行动,从来不比我称之为历史性的、改变世界的条件更重要。核武器无疑是一个——我会说“曾经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被环境变化的问题所掩盖。政治理论在解释我们的无能或压抑、阐释问题及以某种方式教导我们具有责任心等方面的地位何在?您认为政治理论具有那种解释和说教的目的吗?

HP:我怀疑政治理论能否做到。我不知道什么可以做到,但是作为生活在一个在全球中的权力正在下降的国家的老年人,我可能在其他年轻人、处境好的人认为有希望的方面悲观。这(变得悲观)使教学非常困难。你不想跟年轻人那样谈话,但如果那是你看到的,那就必须讲。

六、大学与“学派”

NR:这直接导致我们谈论20世纪60、70年代的大学,这也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大本营。您在伯克利的时候是不是参与者?然后我们将其与今天的大学进行比较。

HP:那时我并不在伯克利。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时期(1964—1966),我在威斯康星州,那次运动并未波及。威斯康星州有自己的学生激进主义,即以追随左翼教授的形式,这与60年代发生在伯克利的运动不同。但是我在1966年夏天回到伯克利,参加了反战运动及6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运动,伯克利运动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我认为在1968年和1969年存在一种可称为“重构大学”的努力,1970年反对这种运动。如果我们尝试评价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与1964年夏天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早期事件有关,在民权运动中,来自各个地方的大量

学生参与其中,然后在秋天就返回学校。

这就是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的发展,那些人想继续在民权领域组织活动,学校想置身于政治之外。

NR:让我们将其与占领运动或剥夺学校投资化石燃料的运动比较一下。它们如何被比较?应该对学校成为政治组织诞生地抱有希望吗?

HP:当然存在希望,万事皆有可能。这与年轻人的年纪有关,他们还未习惯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困境,仍然“不想像父母一样生活。他们显然不享受当下的生活”。

如果他们遇到好老师,大学的经历会引导其思考,促使其有新的发现,引导他们以新的方式把汇聚的信息以及成长过程中收获的信息拼接起来,正如DNA的重组方式一样。他们来到学校,遇到各种思想的融合,见到不同的人,并在讨论课或喝咖啡的时间进行沟通,我想他们现在通过微博进行沟通了。

NR: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同您以前的学生一样浓厚吗?

HP:不,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时的学生比现在的学生对政治更抱有希望,部分原因是政治不如以往富有希望了。

NR:让我们谈论政治理论的未来以结束本次访谈。这个领域正发生什么变化?您对哪个特定领域感兴趣?

HP:我并没有紧跟这个领域的进展,我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教授自己的课程,没有很多精力。我仍然试着写一些有关权威概念的东西。我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几年,但不确定能否在我有生之年完成。

NR:汉娜,我将您归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和教师——伯克利学派的一员。您觉得准确吗?

HP:我很高兴您提及此事,因为我知道一些人认为存在一个政治理论上的伯克利学

派,我并不这样认为。当然,存在一个政治理论学者的小组,成为其中一员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之一。这是一个很棒的经历,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派,我们做着非常不同的研究。

尽管我们尊重彼此的工作,但彼此之间关系紧张。当然在我成为教员之前,很多人已经在那里了,甚至我还是学生时就跟随他们学习。谢尔登·沃林关于政治理论和政治性质的著作,被一些认为存在伯克利学派的解读者归功于这个圈子中的所有成员,事实上,这与诺曼·雅各布森的观点并不一致。

尽管谢尔登与杰克·沙尔(Jack Schaar)一起合写一些东西,在很多事情上一致,但他们的观点不同,也不同于麦克·罗金(Mike Rogin)的观点。尽管我是谢尔登的学生,我们的观点也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伯克利学生的政治原因,我们都或多或少具有左派倾向,但仅此而已。迈克尔(Michael)、杰克(Jack)和我是仅有的早期具有左派政治背景的人。谢尔登和诺曼因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遭遇而具有激进色彩。因而我们并不是一个学派,没有中心人物、领袖,甚至没有学术兴趣的重叠。

NR:您仍在给研究生上课,您会给他们什么鼓励或警告?

HP:与那些喜欢思考的人一起思考,不仅思考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其他,更应该思考与你切身相关的事情,发现与你切身相关的事情及它们如何与现实环境联系,你会发现,在事关自己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上并不孤单。

NR:谢谢,汉娜。

HP:谢谢。

(责任编辑:祝伟伟)